

臺灣人口史的幾個問題

一、主 講：國立臺灣大學教授兼本會委員陳紹馨先生

二、時 日：民國五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時

三、地 點：臺北市延平南路一一一號本會二樓辦公廳

四、出 席：李騰嶽 林崇智 陳百村 黃得時 毛一波 曾今可

曹建 廖漢臣 王世慶 莊金德 王金連 高而恭 陳

世慶 盛清沂 張雄潮 陳漢光 陳石 劉枝萬 馬振麟

李春前 張春生 蕭志行 王詩琅 曹永和 黃典權

五、主持人：李騰嶽 六、紀 錄：王詩琅

李騰嶽：今天我們請到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教授，又是本會新聘的兼任委員陳紹馨先生，來演講有關臺灣人口的問題。

在還沒有演講之前，我先把陳先生的履歷簡單地介紹一下。陳先生早年留學日本，畢業於東北帝國大學，專攻社會學。畢業後任母校東北帝國大學助教，後返臺任臺北帝國大學研究囑託。本省光復後任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教授；並取得日本文學博士學位。民國四十一年，為聯合國學員，赴美國及加拿大研究，並考察社會調查工作；民國四十八年，為美國人口評議會學員，在普靈斯頓大學人口研究所研究一年，途經歐洲，考察人口研究所後回國。到現在為止發表的論文已經很多，其中「臺灣人口增加與社會變遷」乙篇，曾被收錄在美國耶魯大學出版的「人類關係區域文獻」中，並由日本每日新聞社的人口問題調查會譯成日文發表。

各位都知道，前年本會刊行的「方志論文集」裡，陳先生曾發表一篇文章，題為「文獻委員會應有的工作」，這篇文章很重要，主張以往的志書，大都以小數讀書階級為對象，以政治志或政治史為主要内容；現代的志書應以一般人民為對象，以社會文化生活為主要内容。而在方法上也應該有所改變，即採用社會科學的方法去做、去整理。

陳先生從前是在文學院考古人類學系，現在屬於四十九年新成立的法學院社會學系，主講社會學，是一位篤學之士，也是本省社會學界之權威，美國和聯合國時常請他工作，經常很忙。今天幸蒙特地撥忙來會演講。

陳紹馨：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各位委員、各位先生：今天兄弟有機會來向各位報告，感到非常高興和光榮。本來沒有甚麼特別值得報告的，因為兄弟負責寫省通志稿人口篇，很慚愧一直還未完稿，現在快寫好了；今天就利用這個機會把內容的一部份，提出來向各位請教，請各位多多指教。

臺灣人口史的問題很大，這裡祇就中國大陸人口之演變，對臺灣人口變遷的影響，作個簡單的報告。

臺灣是靠近中國大陸的一個小島，其歷史演變，大都發源於中國大陸；而福建、廣東兩省，對此小島之影響，尤其顯著。臺灣的人口，特別是日據以前的人口，是中國大陸人口演變大潮流之一派生現象；故必須考察近代中國大陸人口演變的經過情形，才能瞭解臺灣的人口變遷。

我國的人口，在漢平帝元始二年，即西元二年，就已達六千萬。六千萬人口，在目前並不希奇；但在將近二千年之前，則的確是驚人的數目。然而自此以後，大約一千四百年間，中國人口，並未增加；到明朝永樂初年，即西元一四〇〇年代，才一直增加，在五百五十年間，大約增加到了九倍。

近代的人口統計，大都始自十九世紀初年，在此以前的人口，都是推測的；至於古代的人口，那就更含糊了。世界上，在正史裡有長時期的人口記錄的，祇有我們中國，不過正史裡的人口記錄，也很含糊，必須經過各種分析檢討以後，才能知道可靠到何種程度；而目前，祇好暫時採用此等數字。

前面說過，自元始二年以後一千四百年間，中國人口沒有增加。嚴格來說，在此期間並非沒有增加；事實上增加與減少的循環，所以從長時期的觀點來說，人口並沒有增加。此種現象，在人口史上並不乏例。例如印度，在英領以前之二千年間；日本在德川幕府時代後半期之一百餘年間，人口都未增加。關於這一點，請參看拙稿「社會學與人口學」（二十世紀之社會科學、社會學，正中書局）。

那麼，為什麼一千四百年來不增加的中國人口，自一四〇〇年代以後直線增加呢？為什麼以前不可能的事情，後來變為可能呢？這中間必定有很大的社會經濟上的變化存在。關於這一點，目前在加拿大講學的何炳棣教授有「中國人口研究」(Ho Ping-ti: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638-195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提出很好的見地，以下擬介紹其大概。

據何教授的研究，中國人口數的演變，大體如次：

漢平帝元始二年(西元二年)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明永樂初年(一四〇〇年代)	六五、〇〇〇、〇〇〇
萬曆三十年代(一六〇〇年代)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康熙四十年代(一七〇〇年代)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年)	二七五、〇〇〇、〇〇〇
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年)	三三三、〇〇〇、〇〇〇
道光三〇年(一八五〇年)	四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年)	五八三、〇〇〇、〇〇〇

人口增加，絕非易事，必須有足夠的糧食，人類才能生存，所以糧食增加，是人口增加的前提。據後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水稻自播種至收穫，需要一百八十天，而同一塊土地，一年只能收穫一次。並且需要水份甚多，所以乾燥的地方不宜種植。宋真宗(九八—一〇二二年)時遣使求得占城稻種，一百天就能收穫；後來甚至有六十天就能收穫者，所以一年可以兩熟。而且此一品種耐旱，從前因水份不夠不能種植的地方，現在也可以播種。這樣一來，

不但收穫次數加倍，就是耕地面積也擴大了，人口扶養力因而大增。占城稻的普及，大概就是一四〇〇年代人口現出增勢，從古來之六千萬增到六千五百萬的主要原因。

一四〇〇年代之六千五百萬人口，到一六〇〇年代，增為一億五千萬，二百年間增加一倍以上，是中國人口史上應特書而大書的事實。由占城稻的普及而糧食大增，大概是其主要原因之一。明永樂帝以後二百餘年間天下泰平，也是很重要的事實。天下紛亂，則人民不能從事耕稼，糧食減少，營養不良，身體抵抗力降低，隨之瘟疫就流行。戰亂、饑饉、瘟疫三者經常相伴隨，人口因而大減。所以天下泰平，是人口增加的主因之一。有明一代，民間技術大為進步，宋應星之「天工開物」集工藝方面之大成，而徐光啓之「農政全書」則集農業技術之大成；此二書均出版於明末（前者刊於崇禎十年，即西元一六三七年；後者刊於崇禎十二年，即西元一六三九年）。技術的進步即生產力的提高，亦即人口扶養力的增加。占城稻的普及，天下泰平，及技術的進步，就是一四〇〇年至一六〇〇年二百年間人口倍增的原因。

一六〇〇年之一億五千萬人口，到一七〇〇年還是一億五千萬，一百年間沒有增加。與前一時期對照，這也是值得注意的現象。在近代以前之農業社會，人口倍增的確是了不起的事情；但在當時的農業技術下，一億五千萬人口已達到飽和點，如非再來一次農業革命，人口絕不能再增加。飽和的人口勢必引起人口壓力，促成爭執與紛亂。明朝自嘉靖年間天下就漸漸不寧，嘉靖三十七年（一五五八年）海寇集中閩海，嗣後七十餘年間一直為患。到崇禎元年（一六二八年）李自成、張獻忠流寇四起，跟着清兵入關（一六四四年），在一兩年間將動亂帶到南京以及福建。在此情形下，自一六〇〇年至一七〇〇年之一百年間，人口不增加，也是自然的趨勢。自嘉靖年間，尤其是自一五五〇年代，華南的過剩人口向菲律賓與臺灣本島冒險進出，而當時臺灣人口之情形，必須從大陸的背景來考察，才能明瞭。關於這一點，容後再談。

一七〇〇年之一億五千萬人口，到一七九三年增為三億一千三百萬，在不足一百年間，增加了一倍以上，比一四〇〇年——一六〇〇年二百年間之增加，更為顯著。如果不是社會經濟上有重大之變化，此種增加是不可能的。清朝於一六六二年定鼎，一六八一年平定三藩之亂，一六八三年平定臺灣。自此以後至乾隆末年之一百餘年間，天下泰平——這是人口增加的前提條件。已經在明代集大成之民間技術之應用，固然也提高了人口扶養力，但最重要的還是新作物的傳入。

哥倫布於一四九二年發現美洲新大陸以後，帶回多種新作物。其中花生、地瓜（甘薯）、玉米（玉蜀黍）、洋薯四種，大約在一五五〇年代傳入中國。據何炳棣教授的意見，此等新作物在中國，引起農業革命。新作物對人口增加有甚大之影響，此於人口史上有其明顯之例。愛爾蘭的人口，在一七〇二——一七七一年間，一直保持二百萬之譜；但自傳入洋薯以後，人口大增——一八四一年的人口達八百二十萬，六十年間增到四倍。一八四五年至一八四七年間洋薯之欠收，對愛爾蘭人口實為一大打擊；當時死於饑饉及瘟疫者達八十萬，遷往海外者亦復不少；人口因而銳減。自一八九一年以後，始安定於四百萬之譜。

花生可能是由一五一六年初到中國的葡萄牙人帶來的；一五三〇年代，長江下游已有人種植花生。自其傳入以後三世紀間，傳播於南北各地。長江下游、黃河下游、東南沿海各省，特別在福建、廣東，許多內陸河川流域砂質土壤的利用，引起了一大革命。就是在水田地帶，農民從經驗知道花生的根瘤有肥利成分，且有保持土壤之益處，也都樂意種植；花生遂成為中國之一大農作物。一九三一——一九三七年間之平均年產量，達二八〇萬公噸，與印度（一九三四——一九三八年平均年產量，三二〇萬公噸）為世界兩大產地。

地瓜的傳入，其對人口增加的意義，比花生還要大。因即適宜於邊際土地，而產量又多，故甚受農民珍重；到一八〇〇年代，從東南以至華北，成為窮人的主要食糧。一九三一——一九三七年間之中

國（不包括滿洲）年平均產量，達一八五〇萬公噸，為世界最大之生產國家。米、小麥、地瓜為中國之三大主要食糧，一九三一——一九三七年間之年平均產量：米為五〇〇七萬公噸，小麥為二一七四萬公噸，地瓜為一八五〇萬公噸。

玉米在福建、浙江，種植較少；但在丘陵地區，種植頗多；一九三四——一九三八年間之年平均產量，達六五〇萬公噸，也不失為主要作物之一。洋薯傳來較晚，種植範圍也較狹；但在土地利用上，却有其特殊之意義。

此等美洲新作物，使從來無法利用的土地參加生產，邊際土地甚至山地的開墾甚多，人口扶養力因而大增。十八世紀一世紀間，人口倍增，的確有其充分的根據。因人口激增，故自康熙末年以後常開米荒：例如福建，不得不經常從暹羅買米；地方行政長官，為鼓勵商人從暹羅買米，對採購量多者加以獎賞。雍正乾隆時代之人口增加尤其顯著，雖在豐收年份，米價仍然昂貴。乾隆帝以此為不可思議之現象，曾問群臣，但都不能道出米豐收而米價仍貴的原因所在，後來湖南巡撫楊錫綬道破：這是由於人口激增引起的現象。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臺灣人口的情形。自一五五〇年代以後，福建的冒險家雖常到臺灣本島；但臺灣本島的華人口，在荷據時代，甚至明鄭時代，為數不多。清領以後，華人口逐漸增加，然顯著的增加，則始自康熙末年。藍鼎元在「覆制軍臺灣經理書」中記述康熙末年（六一年，即西元一七二二年）時臺灣之情形，謂「開墾流移之衆，延袤二千餘里，糖穀之利甲天下。……曩者諸羅令周鐘瑄（一七一四——一七一九年）有清革流民，以大甲溪為界之請，鳳山令宋永清（一七〇四——一七二二年）有棄瑯瑤之議，今北至淡水雞籠，南至沙馬磯頭，皆欣然樂郊，爭趨若鶩，雖欲限之，惡得而限之？」；又謂「前者大山之麓，野番嗜殺，人莫能近，今則群入深山，雜耕番地，雖殺不畏，甚至傀儡內山、臺灣後山、哈仔難、崇爻、卑南等社，亦有漢人至其地與之貿易，生聚日繁，漸廓漸遠，雖厲禁不能止也」。為何在短短期間內，突如其來發生此種

人口激增？我們要認清此時大陸上，尤其是福建人口激增的現象，因而瞭解到在臺灣所發生的情形，是此一主流之派生現象；否則就無法領會藍鼎元的記錄的意義。自康熙末年以後，群臣屢次奏請臺米內運的禁止與開放臺灣。自雍正十年（一七三二年）至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〇年）間，携眷入臺或開放，或禁止，辦法屢有更改；自福建偷渡臺灣的問題，也極為嚴重。此等事實，也必須從大陸與臺灣人口演變的觀點著眼，才能瞭解其意義。華人進出南洋一帶為時甚早，但南洋華僑是自一七五〇年代以後，才顯著增加的。推求其原因，實不外乎大陸上尤其是華南地方之高度人口壓力所導致者。前面已提到過，臺灣人口，尤其是日據以前之人口，是中國大陸人口演變大潮之一派生現象，必須考察近代中國大陸人口演變的經過，才能瞭解臺灣的人口變遷。以上所舉，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因傳入美洲新作物，引起農業革命，提高生產力，增加土地的人口扶養力；但到了十八世紀末年，前此增加的人口扶養力已被增加的人口所抵銷，人口再度達到飽和點，因而又發生嚴重的人口問題。被稱為「中國的馬爾薩斯」的洪亮吉，把此中的情形描寫得很透澈。最有趣的是，此時中國的情形，與同時代英國的情形約略相同。英國自經商業革命，農業革命以後，而恰恰在工業革命的前夕，人口大增，問題嚴重，因而有一七九八年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出現。此時之中國也因經過由於美洲新作物之傳入所引起之農業革命，而在一百年間人口倍增，於是現出嚴重的問題來。洪亮吉（一七四六—一八〇九年）在馬氏發表其人口論（一七九八年）的五年前，即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年），發表「意言」一卷二十篇，其中治平、生計兩篇，尤為卓越的人口論。洪亮吉比馬氏早五年發表其人口論，所以把他稱為「中國的馬爾薩斯」，實在不公平，我們應稱馬氏為「英國的洪亮吉」才對！由生計篇的一段文字，可以窺見當時人口激增的情形與其後果之嚴重：「……聞五十年以前，吾祖父之時，米之以升計者，錢不過六七，布以丈計者，錢不過三四十

。一人之身，歲得布五丈，即可無寒，歲得米四石，即無飢。米四石為錢二千八百，布五丈為錢二百，是一人之力即可養十人。即不耕不織之家，有人營力於外，而衣食因已寬然矣。今則不然。為農者十倍於前，而田不可增；為商賈者十倍於前，而貨不加增；為士者十倍於前，而傭書授徒之館不加增。且昔之以升計者，錢又須三十矣，昔之以丈計者，錢又須一二百矣。所入者愈微，所出者益廣，於是士農工賈，各減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價以出市。此即以終歲勤動，畢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溝壑之憂；不肖者，遂生攘奪之患矣；然吾尚計其勤力有業者耳，何況戶口既十倍於前，即遊手好閒者，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以待斃也明矣，是可慮者也！」。

在十八世紀末年再度達到飽和點之中國人口，嗣後的情形將如何，大體可想而知。一七九三年之三億一千三百萬人口，到一八五〇年增為四億三千萬，一百五十年間增加不到五成，與前期比較實在相差甚遠。由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年）洪亮吉的論述，我們已知道，因人口過剩天下漸趨不寧。嘉慶以後亂事漸起，於是有白蓮教之亂（一七九六—一八〇四年），天理教之亂（一八一三年）等發生，繼之蔡牽、朱潰等海寇為患。因英人的入侵，一八四〇年發生鴉片戰爭，不久就引發被稱為「世界最大的內戰」之太平天國之亂（一八五〇—一八六四年）。據學者的估計，在此一戰亂中，直接死於戰鬪及間接死於饑饉、瘟疫者，達四千萬之譜。我們中國地大物博，四千萬人口死亡也無所謂；但現在人口祇幾百萬的國家還很多呢，一百年前之四千萬人口，的確是驚人的數字！

乾隆末年的人口情形，由洪亮吉的記錄可窺其大概；太平天國時代之人口慘狀，則可由汪士鐸的「乙丙日記」，測其一端。汪士鐸（一八〇二—一八五九年）親身體驗此次大亂，其痛切的經驗，使他在「乙丙日記」（一八五五—一八五六年間日記）中，表露與中國傳統「百子千孫」的生活理想完全相反的意見，而極力提倡限制人口之各種方法。汪士鐸充分認識人口增加速度之快。據「農政全

書」，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所以順治元年（一六四四年）時一人，在二百年後，就增為一百二十八人。汪士鐸的家鄉徽州，有早婚而喜人多的風氣；大都十五六歲嫁娶，十六歲抱子，故二十年就增加一倍：是則順治元年時的一人，在二百年後就增為二千零四十八人（乙丙日記、卷三、頁二五）。理論上三十年增加一倍，並不困難，如年增加率為百分之二·四，則每三十年就可增加一倍。如目前之臺灣，年增加率為百分之三·五，則在二十年間可增加一倍。汪士鐸以早婚為高增加率的原因，是值得注意的；²¹ H. Connell 研究愛爾蘭人口，也以早婚為其高增加率的原因。兄弟曾調查臺灣婦女的生育力，由統計可證明早婚婦女之生育力特別高。

人口本來有如此高度增勢，但人多則無業可就，謀生不易，因而引起紛亂。「田產聚之則富，分之則貧；一祖二十孫，遂大戶而為中人，再傳則為貧窶」。人多之害：山頂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闢老林，苗洞已開深箐，猶不足養，天地之力窮矣！²² 「驅人歸農，無田可耕；驅人歸業，無技須人，皆言人多，安能增益。蓋一畝不過一農，一店不過數人；今欲以百農治一畝，千人治一店，如何其能。……今江寧一城被圍時，已有八九十萬，若並四鄉，將及千餘萬矣，天下以刀兵消息之，何法處此。……古有深山老林以辟亂，即桃源也；今深山窮谷，皆成通衢」。「亂世之由，人多；人多，則窮」（乙丙日記，卷三，頁二六—二八）。

人多已為亂世之由，那麼「長治久安之策」應如何呢？「弛溺女之禁，推廣溺女之法，施送斷胎之冷藥，家有兩女者，倍其賦……嚴再嫁之律，犯者斬決……廣清節堂……廣女尼寺，立童貞女院……生三子者，倍其賦，廣僧道寺觀，惟不塑像……定三十而娶，二十五而嫁，違者斬決……婦女服冷藥，生一子後服之，因時因地因事因人，各制宜」（上引書，頁二九—三〇）。「非富人不可娶妻不可生女，生則溺之，即生子而形體不端正，相貌不清秀，眉目不佳者，皆溺之，即皆佳矣，亦可留一子，多不可過二子，三子即溺之。吃冷藥使勿孕」（上引書，頁三〇）。「治民須欲民富，而欲

民富，當首行溺女之賞，貧戶不准生女，及富戶或生二女之罰。民之清修為僧尼者賞，行之三十年而民可漸減，行之六十年，而天下皆富矣……立清節貞女之堂，廣施不生育之方藥，嚴禁男子二十五歲以內，女子二十歲以內嫁娶，及男子有子而續娶，婦人有子而再嫁，犯者斬立決」（上引書，卷二，頁一九—二〇）。

很明顯，此種極端之意見，是由痛切的動亂經驗所引起的；有了此種動亂，則人口增加率降低，也是自然的趨勢。

現在再來看看，大陸上此種情形，對臺灣的人口有何影響。我們

表一、荷據時期以來之臺灣人口數及人口年增加率

年	代	人口數 (千)	人口密度 (每平方公里)	期別	年數	人口增加 (千)	年增加率
一六五〇	荷據時期	一〇〇	二·八	第一期	一三〇年	一〇〇	二·四%
一六八〇	明鄭時代	二〇〇	五·六	第二期	一三〇年	一〇〇	一·八%
一八〇〇	清代	二〇〇〇	五·七	第三期	一八〇年	五〇〇	〇·三%
一八五〇	清代	二五〇〇	七·一	第四期	五〇年	三·四五〇	一·六%
一九〇〇	日據	六〇〇〇	一九·〇	第五期	一三〇年	四·〇〇〇	四·〇%
一九四六	光復	一〇〇〇〇	二九·三				

表二、清領時代之臺灣民變械鬪次數及其時代分佈

年	代	年數	民變次數	械鬪次數	計	每十年動亂次數	每幾年一次動亂
一六三—一八五五	清領期間	二二三年	四	二四	二八	三·四	三·三
第一期 一六三—一六五五	清領至林爽文之亂前	二三年	六	四	一〇	〇·九	一〇·三
第二期 一六五五—一八五五	林爽文亂至戴萬生亂前	二〇〇年	三	二〇	二三	六·六	一·五
第三期 一八五五—一九四六	戴萬生亂後至日據前	一〇〇年	四	〇	四	一·三	七·五

把荷據時代以來之人口數與動亂之情形，綜合在表一與表二。早期的人口數，當然很有問題，但在還未有更妥切的數字以前，只好姑且採用。

由表一可以看出，自荷據時代的一六五〇年至明鄭時代的一六八〇年，在臺華人口從十萬增到二十萬，三十年間增加一倍，年增加率為二·四％。這是第一期。第二期從一六八〇年至清代的十八一〇年，即嘉慶十五年，人口從二十萬增到二百萬，一百三十年間增加一百八十萬，年增加率為一·八％。第三期自一八一〇年至一八九〇年，人口從二百萬增到二百五十萬，八十年間祇增加五十萬而已，年增加率為〇·三％。第四期自日據初年（一八九五年）至光復（一九四五年），人口從二百五十萬增到六百萬，五十年間增加三百四十五萬，年增加率為一·六％。第五期自光復至民國四十七年（一九五八年），人口自六百萬增到一千萬，十三年間增加四百萬，年增加率為四·〇％。

第一期因起碼的人口量不大，二·四％的年增加率顯得很高。第二期在一百三十年之長期間，每年平均能有一·八％之增加，在近代以前的農業社會，是為例不多的高增加率。此期與大陸上一七〇〇年代至一七九三年（康熙四十年代至乾隆五十八年）的人口大增期，大體相符。此期之一·八％年增加率，比日據期（第四期）之一·六％還高，這是值得注意的；不過在日據期，因日本殖民政府極力避免臺灣與大陸的往來，盡量限制大陸漢人入臺，所以臺灣的增加人口，大都是自然增加的，但第二期的增加，包括很多從大陸遷入者。

臺灣有一句俗語：「三年小變，五年大變」。清領二百三十三年間，一共發生了四十三次民變，二十四次械鬥，合計六十七次動亂。平均每十年發生三·一四次動亂，也就是每三·二年有一次「變」（參看表二），所以前引俗語，在清代大體上是對的。不過此等動亂，在時代的分佈上，却有所不同。從清領（一六八三年）到林爽文之亂發生的前年（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年）共一〇三年間，可以

稱得上天下泰平，只發生十次動亂，平均每十年發生〇·九七次，即一〇·三年才發生一次。在此太平時代，人口顯著增加，也是自然的趨勢。可是自林爽文之亂發生的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年）至戴萬生之亂平定的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期間，情形就大不同了。八十年間發生五十三次動亂，平均每十年發生六·六二次動亂，亦即每一年半發生一次，與前期比較，實有天淵之別。表一第二期，大體為太平時期，人口年增加率是一·八％；但第三期則為動亂時期，所以人口年增加率只有〇·三％而已，由此可知，治亂與人口增加率，有密切之關係。戴萬生之亂以後，西方國家覬覦臺灣，清廷也不得不加強其統治，自此以後動亂次數就變少了。

由上所述，大體可以明瞭，清領及其以前之臺灣人口演變，是大陸上人口變遷主流之派生現象。故必須從大陸的情形來考察臺灣人口，才能明白其變遷的意義。

李騰嶽：有關其他人口問題，各位有甚麼要知道的，不妨請教。

張雄潮：中國大陸的人口，剛才陳教授說，從漢平帝時代起一直到明永樂年間，中國人口，始終只有六千萬，沒有增加。我想這是不可靠的，人口和開拓是相互為因果的，一千幾百年裡，要是中國人真是這樣沒有增加，中國文化豈非將停留在黃河兩岸，何致後來發展到長江以南，一定因古代對人口問題粗放，長期沒有調查統計，以致一千幾百年裡，始終停在一個數字。

古代人口調查太不正確固不足怪，現代也有這種情形，我們中國人口在晚清戶部和海關外人的調查，說是有四萬萬，可是經中共匪幫的普查，說是有六億，你看幾十年間，就相差得這麼大，足見晚清的調查統計，亦是極不可靠的。又古代的戰爭限在點和線，現代的戰爭是全面的，軍民因戰爭而死亡的，古代決不會同現代那麼多；洪楊之役只在長江兩岸一線上，陳教授說死亡四千萬，這數目恐怕也很不確實，中國對日抗戰，和剿匪戡亂諸役，延及的區域，要比洪楊之役大得多，可說那是空前的，而死亡的軍民，頂多也不過三四千萬；洪楊之役，要是真的也死了那麼多的人，何致現在中國

人口有六億之多；我想這也完全由於過去的沒有調查統計，或在由於調查統計的太不確實，所以才有這不可靠的數字。我這話是否對，請教陳教授。

陳紹馨：漢平帝至永樂年間的人口，並不是始終停在一個數字，其間當然有增減變化；不過祇是增加與減少的循環而已，所以從長時期的觀點看，人口並無增加。在近代以前之農業社會，人口達到飽和點以後，除非有新技術的出現或新疆域的開拓，人口祇經過增加與減少的惡性循環，其總數在長期中不增加。這是人口學上的一般趨勢，人口史上也不乏其例。據學者的研究，印度在英領以前二千年間，人口總數沒有增加。其他還有很多類似的例子，所以中國有此情形，也並無不可。

古代的人口數字不可靠，已經提過。這與現代人口統計上的人口數比較，其性質與內容都不同。現代的人口數，是包括男女老幼全部的數目，不過有時也有例外，例如不包括軍隊或外僑等。古代的人口計算，大都為徵稅或徵兵而舉行的，與此目的無直接關係的，常被除外，例如壯丁以外做官的、當兵的、僧尼、奴隸等，常不包括在內；而其辦法也由時代而不同。正史中之人口數，其疆域如何，也是要考究的。嚴格地說，我們應將一時代之人口數，從各方面分析檢討以後，才能知道其可靠到何種程度，或者推斷另一個人口數。未作此種工作以前，我們祇好採用正史中的人口數，並不能因此種數字之可靠性低，而放棄研究工作。考古學家使用的資料，都是很不完全的，斷片性的，但是他們還是不斷努力工作，當然要常努力獲取更完全的資料。還有，古代人口的準確數字，無論如何是絕對無法知道的；但由各種分析，可以知道人口演變的趨勢。就是現代歐美文明國家的人口統計，也不是絕對準確的。一九五〇年之美國人口普查，就有很大的漏計。至於生命統計，如有百分之九十五之登記，就算準確，百分之百的準確性是絕對不可能的。當然我們要經常努力提高資料的準確性，但科學的方法的要點，是在於求事物的相對關係與發展趨勢；所以祇要知道我們所用資料的性質，就

無妨把它作為研究資料。

太平天國時死亡四千萬，是中西學者根據各種資料推算出來的，並不是兄弟個人的意見。此數並不是祇指因戰鬪而死亡者，而且包括由饑饉、瘟疫等而死亡者。現代的戰爭，因武器發達，直接的殺傷力很大；但因行政衛生組織完備，由內亂、饑饉、瘟疫死亡者，反為數不多。現代以前之戰亂，武器的殺傷力雖較低，但由內亂、饑饉、瘟疫引起的死亡，却為數甚鉅。至於抗日剿匪戡亂諸役，其規模很大，是明顯的事實，但兩者的性質却有所不同。在抗日戰爭中，大後方的人民熱烈團結，抵抗外敵，並無內亂、饑饉、瘟疫，所以由直接戰鬪或敵機轟炸死亡者雖多，全部的死亡比太平天國時少，也是可能的。太平天國時之中國人口為四億三千萬，假定死了四千萬，還有三億九千萬。又假定年自然增加率為百分之二，那麼祇要二十多年，三億九千萬就變做六億了；人口增加之快，實在快得驚人！

陳漢光：我的意見同張先生差不多，想來補充一下。張先生所說，開拓和人口是同時發展的，我同意這個意見。中原人遷移福建便是一個實例：本來福建海島大部份沒有人，可是到了南宋，這些海島大都已經有人居住。看福建通志，有唐代寫的詩，描寫龍溪等於是個鄉村；到了宋代就不同，已經很繁榮；到了明代又不同。就此，更可看出開拓與人口發展的關係。明初福建有築海為田，利用海耕作，這或者就是現在的海埔新生地，由此看起來，福建到了明代已是山無可拓了。說早一點，南宋以後就慢慢發展到海上去了。永嘉之後，福建開始有較多的中原人遷徙，唐代又增了若干，到了宋代更是繁多，明代那更不用說了。以此例子來看，陳教授所說的到明代為止中國人口沒有增多，這可能尚有研討餘地。

陳紹馨：在農業社會，人口達到飽和點以後，除非有新技術的發現或新疆域的開拓，人口就陷入增加與減少的「惡性循環」，而長期間不增加。唐代以後江南逐漸開發，人口也隨之大增，這方面已經有各種研究。但江南開發以後，江北是否維持原狀？如因政治關係

或因入侵中原之塞外民族的技術水準較低，人口扶養力降低，因而江北的人口減少，則江南人口雖有增加，從全體來看，總人口可能不增加。不過此等事情，都要根據具體材料作各種分析，才能斷定；在目前，只有用正史的記載；而由正史的記載，却自漢平帝以後一千餘年間人口未增加。

人口的增減是由各種因素決定的，土地、技術、政治、社會等等因素，都會影響人口變遷。在農業社會，從長時期的觀點看雖不變，但其間常有顯著的變化。例如德國的三十年戰爭（一六一八—一六四八年），傷亡慘重，經一百多年才恢復戰前的人口。經一次大戰亂大瘟疫，就死了很多人，須經長時期才能恢復；但恢復以後人口超出飽和點，就再發生戰亂、饑饉、瘟疫，人口再大減。就是因此種增減的循環，所以從長時期的觀點看，人口不增加。這是農業社會的一般趨勢，而人口史上的事例也大都如此。

陳漢光：宋代尖米的推廣時間為何那樣慢，這是使人懷疑的，其後傳來的落花生不但是供食用，對土壤也很有利益。因為落花生含有根瘤菌，可以成為肥素，對開發上也有意義，瘦的土地會變成肥的。所以我想，宋代到明永樂這段期間沒有人口增加，是很懷疑的。是不是那些有利增加人口的作物推廣太慢的關係是嗎？

陳紹馨：漢平帝以後之人口數，都在六千萬以下，到明成祖的永樂初，才有六千六百萬的記錄（何炳棣教授作六千五百萬）。當然絕對數是不可靠的，不過由此可以看出增加的趨勢，這大概是占城稻漸形普及，人口扶養力漸漸增加的結果。從前沒有像現在的農業行政機構，新作物的推廣自然也不容易。花生、甘薯、玉米等美洲作物，大約在嘉靖年間（一五五〇年代）傳入中國，但二百年後，才有官方的推廣。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年）閩浙總督郝玉麟調兩江總督時，始將玉米的種子從福建安溪帶到兩江去。明年，安徽巡撫陳大受，派人去安溪購種數十石，分發所屬裁種，嗣後玉米從兩江傳到川、陝、雲、貴各省，到道光年間，雲貴兩省已以玉米為主要食糧。至於甘薯，乾隆十年（一七四五年）陝西巡撫陳宏謀先傳種於

陝西，過了幾年，山東布政使李渭也教山東人栽種。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年）秋，乾隆帝以河南、山東連年饑荒，命兩省栽種甘薯，特命福建巡撫雅德，從閩將薯種由驛速寄河南，再命直隸總督，從山東購種。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年）冬，乾隆帝勅各省廣勸栽植甘薯（羅爾綱：「太平天國革命前的人口壓迫問題」，中國近代史論叢，第二輯第二冊，五五—五六頁，正中書局）。由此可以知道，推廣工作實在太慢，而其推廣則是由饑饉所促成的。

盛清沂：陳教授的高論很欽佩，這和我學歷史的有點巧合。漢平帝的時代中國的人口六千萬，這一直到明永樂年間沒有增加；從歷史上來看，漢代疆域大，漢代以後，三國的疆域就小，唐代也大，可是沒有超過漢代的範圍；唐以後，形成統一局面，不過雲南還不歸中國的所有。宋以後，疆域一直沒有變，南宋、元代，中國本土沒有現代大。明的永樂時，疆域相當大，到了清代乾隆年間，疆域很大，金人、元人、土番統統被中國同化，這我想也是增加的原因之一，請教陳教授。

陳紹馨：兄弟個人對歷史地理沒有研究，所以正史中的人口數究竟包括何種疆域，兄弟不清楚。盛先生所講的，很有意思。明代以前的疆域已不超出漢代，那麼明以前的人口不超出漢平帝時的六千萬，似乎也有道理。明清時代疆域的擴大，可能對人口數的增加有關係。但這是兄弟的推測，至於正確的情形如何，還要就具體資料檢討，才能斷定。

李騰嶽：我曾看過一本書，書名忘了，大概是說我們中國每次動亂，人口減少得很快，很厲害，晉代五胡十六國大動亂的時候中國被殺的人口最多，人口的減少也是最厲害的一個時期，不過這時候沒有正確的數字。

陳百村：臺灣人口除高山族外其餘大概是由閩粵兩省人渡海而來。邱仙根先生詩所謂潮惠漳泉齒最錄是也。此在現時可以說人皆知之，無庸細說。但是今天聽陳先生的講述使我對臺灣人口問題得到進一步的瞭解。因此而連想到自己的故鄉。我故鄉是在福建省最北與

浙江省最南之間。這個山縣叫做平陽縣。縣內人口半數屬閩語系（吾邑人謂之福建話實則閩南語也）據十餘年前統計，全縣人口為七十三萬餘，說福建話者過半。又自洪楊之後。吾浙以杭嘉湖三府受害最重，人口減耗亦最甚。因此吾邑人自動往彼三府謀生者亦殊不少。至今彼三府人猶稱此輩寄居謀生者為僑民，亦猶廣東人所云客家。合之上面所說統計數字，總計閩系語人口當超過四十萬。

究其原因最初當因清順治間強迫遷海，一時無可容身，不得不冒險北走，其時吾邑山間居民稀。因此遂為閩南人投止處所。據我的淺測得下列三個證據。第一、我的姑媽嫁青街李家。李家宗譜就載有其始祖留下字據云。「後代子孫切不可忘掉你的遠祖是福建南安呂坪人」外此凡諸大姓，多能各舉其所自出。如曰廈門安海，曰永春德化，曰同安灌口，曰漳州芝山等不一而足。雖未必皆有字據，要非全是假言。第二、今閩南各屬與吾邑以及今之臺灣閩系人所有言語風習殆皆大同小異。而以言語為最明顯。譬如「鐵橐」一詞，義為嬉戲（本字當作躑躅）與福州話之「卡僚」相同。今上舉三處，均仍有其語而外人聞之無不驚異者。第三、吾邑在明清桑海之交，歸化清朝最遲，約在康熙後半期，始漸有奉行所屬行之剃髮結辮以及其他服制等等，此亦可見其雖被迫而避地北徙，而不願歸順清廷，亦為一般人民普意識也。以上就個人見地引申為說，不知亦有當否，請陳先生及在坐諸先生指教。

陳紹馨：陳先生所講的是很有趣的事實。一個地方的人口密度太高，謀生不易，就向密度較低的地方遷移。這就是所謂國內移民。乾隆時代人口著增的時候，常有這種現象，例如江西、廣東、貴州的人，遷入雲南；湖南、湖北、河南、甘肅等省的人遷入陝西。從福建、廣東、遷往海外的所謂華僑很多，但從這兩省遷往其他省份的也不少；這是因為福建、廣東兩省，面積雖相當大，但耕地面積却不多，所以對總面積的人口密度雖不高，但對耕地面積的人口密度却甚高，比江蘇地方還來得高。對這方面，中外學者都有各種研究。因人口密度太高，謀生不易，所以要向海外或國內其他省份，

求其出路。遷往其他地方的人們，還保持其舊有的生活文化，也是常見的事情。

陳百村：剛才聽到陳先生講人口與耕地面積問題，歷舉許多數字，多是我這個淺識者所未聞。但我的淺見，耕地面積的大小與人口的疏密，當然是相對的正比例。但就生產言，生產面積與面積生產仍然是不同的兩個問題。因此我又想起一個前事。抗戰時我曾參與崑崙關作戰。崑崙關即宋史上狄青破儂智高處也。戰事告一段落。部隊北返我與施北衡兄同車由遷江回柳州。小汽車走了兩三個鐘頭，所見幾乎盡是荒野，人家稀少，耕作物更鮮有見，不覺大為驚異。後廣西省府嚴廳長（財政廳）來晤，譚及此事。嚴云「此一片地，俱是不能蓄水，所謂地漏，人皆謂其地廣人稀。不知其地雖廣而不可耕種，人皆去之，所以人希。設使是膏腴一片，其必四方走集，田廬相接，衡宇相望，何至於人稀」，嚴說甚是。可見所謂廣土衆民，乃因其壤地寬廣，而復土質肥美。不然，何由得以聚衆。雖地廣而土肥，而聚居日久人口繁孳，地之所出漸不足贍，因而講求墾殖以求增進所產。古人所謂深耕淺耨，現時術語所云面積生產者，充此道也。可見人口與土地關係當以其生產結果如何為準，不厘計其土地廣狹為已足也。以上是我一些淺薄見解，不知亦有是處否，並請陳先生指教。

陳紹馨：人口的密度，不但就總面積計算，還要就耕地面積計算，進一步還要考察土地的生產力或技術水準等因素。具體個別的分析當然要考慮有關的各種因素，不過在一般性的考察，只就耕地密度計算，就可知其大概。

黃典權：今天有機會來恭聽陳教授的高見，我覺得很榮幸。我有幾點要請教：臺灣外記裡面有一段，鄭經來臺灣的時候，因為部下的單身漢找不到太太，於是有人到廣東的遠濠地方捉女人來臺灣賣，其他的地方沒有，因此，臺灣的人口大增。清初，志書的記載，鄭克塽投降後，鄭方有造冊的多回去，恐怕未投降的沒有造冊，臺灣留下的人材很多，遷回大陸和人口是不是有關係有影響？看這兩

點可以知道，是不是？

陳紹馨：移民，尤其是逃難的移民，大都是青壯年男人，女人、老人、小孩絕少。初期的臺灣，多係無家眷的單身漢，這是有各種記錄的。從廣東捉女人來臺灣賣，既然有記錄，當然是事實，但這是異常，非法的事情，在被捉的地方，大家也會預防警戒，所以其數目不會太多，對人口數的影響，自然也不會太大。鄭克塽投降以後，回到大陸的人有多少，因沒有可靠資料，不敢斷定，不過大體可以推想，做官的，尤其是大官，非回大陸不可，但一般老百姓，以當時的交通運輸工具來看，一時幾萬人回去是困難的，是不可能的。不過這也是我的推想，還要以資料來論證才行。這兩事對臺灣人口的影響都不會太大。

黃典權：當時臺灣的駐兵為數不少，軍隊也計算在內的意義怎麼樣？

陳紹馨：荷蘭時代的記錄，還有幾個人口數字，但鄭氏時代的人口數記錄絕少。鄭氏的造冊，當然包括軍隊。明鄭時代施行屯田制，軍隊與人民難分，人口數可能包括軍隊。

陳漢光：乾隆時代的潮州府志載有海盜人民捕捉女人，漳浦、平和流行有句「刺瓜刺刺，東都着來去，來去尤有「某」（妻），以免

唐山怎艱苦」。東都就是臺灣，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是明鄭遷回大陸，北部的一部份人同時也遷回大陸，後來又遷回來。

竹塹本是已經開拓了，可是郁永河採硫磺，從南部來到此地，還是荒涼得不得了。

兵有沒有算，屯兵有沒有算在內，是不知道的。

陳紹馨：捉女人來臺灣的事情，對社會人士心理上的影響很大，自然文人也以動聽的筆調記錄它，但此種異常，非法的事情，不會太多。

林崇智：陳教授今天講演給我知臺灣人口的演變的一個大概，陳教授以為要知道臺灣人口的演變，必須先從中國大陸人口的演變來看才能夠明白。陳教授列舉歷代史書記載事例加以說明中國大陸人口的演變實基於政治經濟因素，臺灣人口的演變也是一樣，臺灣雖然自荷蘭開始，但到了鄭成功復臺，才正式建立了政治基礎，臺灣人口都是受中國大陸人口演變的影響，到了日據時期又因殖民政策的政治因素，而受到影響。陳教授今天講演僅就其大體的趨勢和意義，給我們一個概念，講得很輕鬆很明晰，兄弟現在代表同人謝謝陳教授。